#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及其后果

1937年7月7日夜在北平(今北京,以下同)西南郊卢沟桥畔发生的事件，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而且也是日本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就事件本身（日军演习、听见枪声)说,在当时北平、天津及整个华北的政治军事形势下，本来是经常发生人们已习以为常的小事，但它所引发的后果却是无比巨大的：中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被迫半途而废，人民忍受着空前严重的物质和精神的牺牲，把大半锦绣河山变作抗敌的战场。日本帝国主义从卢沟桥事变开始，把侵略战争不断引向扩大，使它在国际上逐渐孤立；而它在国际上愈孤立，就愈要扩大侵略，以掠夺为扩大侵略而必需的战略物资。终于使它陷入到世界人民的齐声反对之中，最后以可耻的投降结束它的东亚称霸梦。这个最初发生的事件，我们习惯上称它为卢沟桥事变。

## （一）卢沟桥事变的背景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有它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根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基本国策的产物

(1) 日本通过不断发动侵华战争实现了国家军国主义化。

日本自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开始，就把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和附属国定为基本国策。因为日本国土狭窄,国内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其资本积累的速度受到极大限制，在资本力量和生产能力方面日本无法同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遂确定用军事手段把中国变成其独占殖民地，垄断中国市场，作为其发展资本主义的主要方式。从 1894 年甲午战争始，日本不断地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强迫中国割地赔款，攫取特殊权益。这些巨额战争赔款和在中国的巨大权益，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更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根据 1889 年公布的日本《帝国宪法》,日本实行天皇制专制主义政体，天皇总揽立法、召集和解散议会、制定官制和任免国务大臣及陆海军将帅、宣战、媾和等全部统治大权。议会只有对法律和预算的赞成权，不过是天皇的表决机器。内阁是天皇任命的辅臣，只对天皇负责。而军部直属天皇，其权势远在议会和内阁之上。随着其对外侵略的连连得手，日本军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受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日本军内一些法西斯小团体“一夕会”、“樱会”等纷纷成立。他们策动发起一次次暗杀和武装政变事件，推动成立军人内阁和实现国家军国主义化。 1929 年 11 月发生了枪击首相滨口雄幸事件,1930 年 3 月又发生胁

迫政党内阁辞职，要求成立以陆相宇垣一成为首的军部内阁的武装政变事件，1931 年 10 月又发生袭击首相官邸要求建立以教育总监荒木贞夫中将为首的军部内阁的武装政变事件。这几起事件虽然没有成功，但凶手和政变策划者在军方庇护下都没有受到认真追究，因此，事件对军队中的狂热分子以强烈刺激。此后，又接连发生 1932年血盟团暗杀事件、五一五枪杀首相犬养毅事件、1934 年士官学校事件……直到 1936 年的二二六事件。其中有两个事件对日本政治影响最大：五一五事件结束了日本政党内阁的历史，以后的政党都成了军部的应声虫；二二六事件恢复了军部大臣的现役武官制，确立了军部对政府的实际控制体制。从此国策大转变，整个日本已经成为一架疯狂运转的战争机器。

(2)侵占华北进而侵占全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既定的战略步骤。

在日本国内如此强大的军国主义势力驱策下，其侵略中国的步伐显著加快。它不仅不再满足跟在后面充当瓜分中国的西方列强附庸的角色，而且树立了赶走西方势力，要做东亚霸主的‘雄心’。他们把未来世界的命运看作是由‘代表西洋的美国和代表东洋的选手日本之间的争霸战决定的’。为了‘获得东洋的选手权，必须迅速地把我国的势力范围扩张到所需要的范围。’① 这个‘范围’主要指中国。他们

①石原莞尔《满蒙问题之我见》中语，此处转引自色川大吉《昭和五十年史》第 231—232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设想分两步走 第一步征服‘ 满蒙 ”,第二步征服全中国。于是 1931 年日军发动‘ 九一八 ’事变,随后成立伪‘ 满洲国 ”,把东北三省从我国分离出去，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1933 年 1 月，日军攻陷山海关，打开了进犯华北的大门。 3 月初侵占了热河省，并继续进攻长城沿线的各军事要地。 5 月中占领冀东 20余县，平津和整个华北已全部暴露在日军的枪口面前。

直接的军事进攻之外,日本还用‘ 谋略 ’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地。 1933 年 5 月，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胁迫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把冀东划为‘ 非武装区 ”,把中国军队赶出了冀东 22 县。1935 年 5 月，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胁迫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签订《秦土协定》，规定国民党党部和军队从察哈尔省撤出。同年六七月间，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又胁迫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把国民党在平津两市和河北省的党部、军队和宪兵全部撤走，撤换省主席和市长,并按日本要求禁止‘ 排日 ’活动,使中国政府在冀察的主权大部丧失。1936 年日军又增兵华北,进占丰台,直逼北平城下。

此时的北平已处在日伪的三面包围之中：东面是日本扶植的伪‘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北面是已并入伪‘ 满洲国 ”的热河省，西北是日军收买支持的李守信、王英土匪武装。只有西南面的宛平县还在二十九军手中。此时,由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控制的平汉铁路成为北平通向内地的唯一要

道，其战略地位已是北平的生命线。

日本最初的目标是拉拢、胁迫地方实力派宋哲元搞华北五省“自治”,使华北成为日本的“新殖民地”①。1936 年 1 月，日本政府给其华北驻屯军发出下述指令：“自治地区应以华北五省为目标，首先稳步实现冀察二省及平津二市自治，进而使其他三省自行之与合并。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领导,当前应通过宋哲元进行之。”② 他们同意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主任，然后，采取各种手段频繁地向宋提出摆脱国民政府“干涉”,单独与日本搞“华北经济提携”的方案。内容主要有修筑具有战略价值的津石铁路、塘沽、大沽海港,开发军需资源,如恢复龙烟铁矿、收购棉花、羊毛和长芦盐，以及华北航空等等。日本的这些要求如果全部答应，那么冀察二省也就同伪“满洲国”相差无几了。宋哲元拒绝签署任何协定，使日本原来设想的通过宋哲元控制华北的计划完全落空，成为所谓“悬案”。日本当局在恼羞成怒之余，认识到“有驱逐宋哲元而代之以其他人物之必要”③,于是开始了新的“谋略”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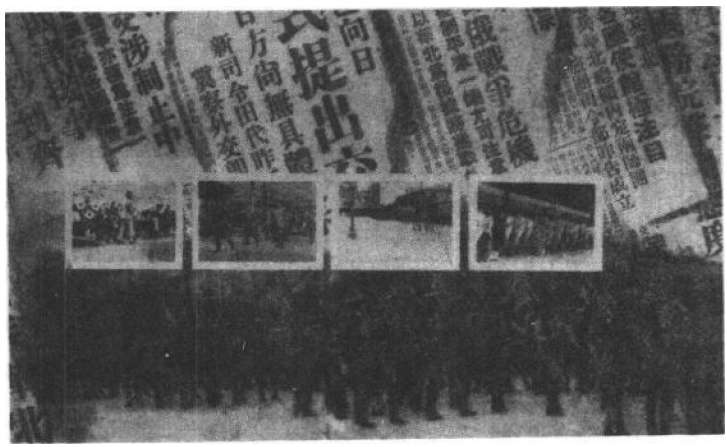
1937 年春开始，日本政府和军部纷纷派人到华北考察了解情况。这些人一致认为日中间的“悬案”只有通过武力

①日军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给关东军司令部秘密报告中语。转引自《日本大陆政策的真面目》第 115 页，上海生活书店版。

②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第 8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③日驻华武官矶谷廉介致陆相电报中语，转引自李云汉：《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 202 页，台湾正中书局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36 年 5—6 月，日本为准备武装占领华北，擅自决定增强其“华北驻屯军”，编制由联队改为混成旅团，司令官由军部任命升格为天皇直接委任，兵员由 2400 人增至 8400 人,实际达到 10000 名以上。日本增兵华北引起国际强烈关注。图为《时代》周刊 1936 年特刊所汇集的有关日军增兵华北的图片报道。

（中国革命博物馆提供）

才能解决。日教育总监本部长香月清司中将到中国东北、华北考察一个半月，6 月 5 日他就华北状况报告说“：华北形势相当紧张。因此，中国驻屯军增强兵力很有必要。①此时另一个在华北搞调查的日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也报告说“：用了几天时间在北平、天津会见了中日要人，征求他们意见和感想。结果都认为中日双方很紧张，颇有一触即发之感。”② 与柴山一起来华的日参谋本部第七课长永津佐比重在 6 月 8 日的报告中更明白地说：“担心华北不一定什么时候，或什么样的事件要爆发。”③ 而当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大多数的意见认为，对中国打击一下就能改变局势”④。这时在东京政界传出这样的消息：“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湖一样的事件。”⑤ 这些情况表明，华北日军策划卢沟桥事变的阴谋已经形成。

日本的“谋略”专家石原莞尔时任参谋本部第一(作战)部长。6 月 18 日他特派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到华北现地视察，指示他的任务是：“(1) 再次传达中央的既定方针，并严格指示不许搞谋略行动；(2)对于经常因步哨而发生纠纷的步哨问题要合理解决。”并强调“：对卢沟桥附近的形势

①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1 卷第 1 分册第 122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②同上书，第 122 页。

③同上书，123 页。

④同上书，第 123 页。

⑤《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2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

必须留意 ’①。石原的话说明：日本华北驻屯军中确实在搞“ 谋略 ”,所以才有他‘ 不许 ’的指示。而实际上,石原既无那样大的权威;‘ 谋略 ’分子真的因他‘ 不许 ’而停止‘ 谋略 ’行动,他也没有那样大的气魄,真的有能力制止‘ 谋略 ”,连冈本清福也不买他的帐。冈本到华北后完全了解现地日军准备搞“ 谋略 ” 的事实，但回东京后却作了掩盖事实真相和完全颠倒黑白的汇报,说‘: 中国驻屯军全然未见有何行动,但根据日中间反感日深的事实，预料从中国方面可能出现某些挑衅行为。因此，到那时必须有采取断然措施的思想准备。”② 这些透露出来的消息和调查人员的报告已经明白无误地指明：华北日军已经紧锣密鼓地暗地做好准备，要在 7 月 7 日夜于卢沟桥上策划一起嫁祸于中国方面的“ 谋略 ” 事件。

2. 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激起中国民族意识的空前高涨，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抗日救亡

但是,这时中国的形势已与‘ 九一八 ’事变时期大不相同。1931 年以前,中国正在经受着长达 20 年的由于推翻帝制而引发的政治剧痛。革命势力此消彼长,新旧军阀连年混战。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主要对着瓜分中国最烈的英、俄、美、法等西方列强,日本帝国主义只是其中之一。

①《陆军作战史》第 123 页。
②《华北治安战》,第 18 页 .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惊醒了中国人：原来只是西方列强附庸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它已不满足于一般的“门户开放”、通商通航、最惠国待遇、划分租借地等权益。“九一八”事变和紧接着的华北事变表明，日本要把中国分割成一块块像“满洲国”那样的殖民地，为它称霸世界的战略服务。亡国的危险迫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1935 年“一二九”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第二年，平津学生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原学生联合会改名为学生救国联合会。5 月，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学生的爱国运动促进了社会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文化界、妇女界、劳工界纷纷组织救国会，他们宣传抗日，出版救亡刊物，罢工罢课，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空前高涨的局面。人民强烈的抗日要求对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准备抗日的转变是有力的推动。

最早和最坚决发出抗日呼声的是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共就不断地通过决议、宣言、告同胞书等形式，向全国人民指明当前“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①]的国难形势，号召全国人民抗日救国。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救国为己任，率领工农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即以陕甘为根据地领导全

①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三四册补编第 372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国人民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并且成功地得到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两将军的支持，以西安事变为标志，至 1936 年底，已实际结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举国一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九一八”事变时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主流派蒋介石，经过数年的艰苦经营，这时已大体完成了全国“统一”。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的猖狂侵略，在隐忍妥协一再退让的同时，也做了大量的军备和防务建设。1936 年 8 月，四川成都和广西北海接连发生日本特务人员被民众殴死的事件。日政府借机大作文章，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并派军舰到北海港游弋。对此，蒋介石电令军政部长何应钦：“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并说：“交涉迟早必至破裂，准备实不可一息缓也。”① 1936 年 7 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对外侮的最低限度”和“最后关头”加以说明：“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②表示不再退让。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使蒋介石终于说出了“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

①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第 675、679 页。

②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 4 册第 433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① 等果断的话。从此，国民政府和全国人民一道走上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自救之路。

## （二）卢沟桥事变的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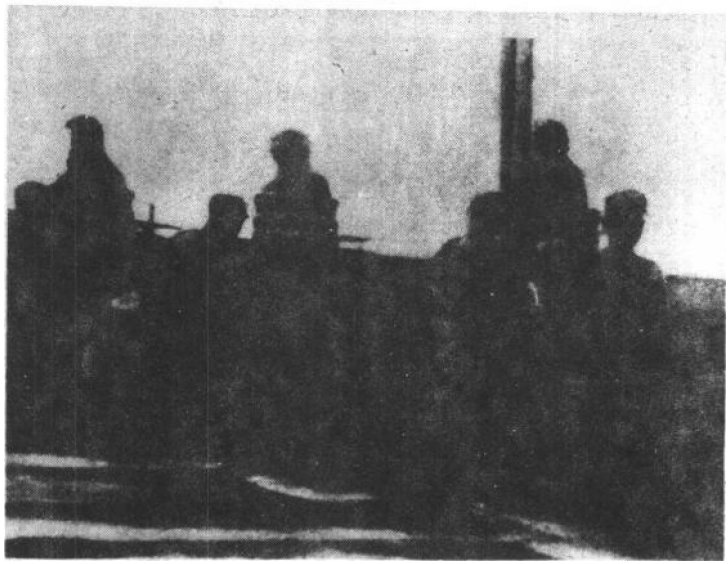
### 1. 1937 年 7 月 6 日,危险的预兆

1937 年从 5 月开始，驻丰台日军每天都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的地点选在贴近中国军队严密防守的宛平城以北约 1 公里的沙石场和与之相对的永定河西岸一块荒地，平汉铁路桥就在这块荒地上通过。据华北日军第一联队《战斗详报》记载,日军演习是有特殊计划和特定目标的。其中隐晦其辞地说“:根据我方对中国总形势的分析,侮日排日情绪日益高涨，预计不可避免地迟早要发生异变。”“联队全体将士专心致志进行黄昏、黎明和夜间的训练;另外,对驻屯地附近的地形,要求每一个士兵都要熟悉,并能在夜间自由活动。再一方面,在制定奇袭中国军队的指挥机构、兵营、城门等演习方案时，均要调派各级军官进行实地反复勘察。”这些战斗演习“不分昼夜进行”②，演习日军多次故意要从

①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 5 册第 27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日军《第一联队战斗详报》第 1 号,译文俱见《北京档案史料》1990 年第 3 期第 39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37 年 7 月 8 日,日军进攻卢沟桥，中国守军奋起抵抗。

（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宛平县城通过，又经常派官兵到中国军队警戒区铁路桥及回龙庙堤坝一带活动。6月 25 日以后，天津日军司令部和北平旅团司令部的大小军官轮番到卢沟桥、沙岗（日军称“一文字山”）在宛平城东门外仅 300 米处）、回龙庙“视察”情况，检阅演习①，夜间的实弹演习更加紧张，演习的枪弹经常打在宛平城墙上②。这一切表明日军采取武力驱逐宋哲元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7月 6 日一大早，驻丰台的一队日军到宛平县城东门口，要求从城中通过到长辛店去演习。中国驻军不许，相持达 10 余小时，至晚始退去。③

当丰台日军还在宛平东门纠缠的时候，北平城内的日军武官辅佐官今井武夫正在出席一个朋友的宴会。宴会刚开始，事前并未受到邀请的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突然闯进来对今井武夫说：“武官！日华两军今天下午 3 点左右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眼下正在交战。武官知道这情况吗？”今井答以不知。石友三固执地说确有其事。并请求：“即使日华两军果真发生全面战争的话，驻在北平北郊黄寺的我的部下，对日军是不怀战意的，所以请你务必尽力不叫日军攻打他们。”④

①《第一联队战斗详报》第 1 号。

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7 页。

③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 47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年版。

④《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2—1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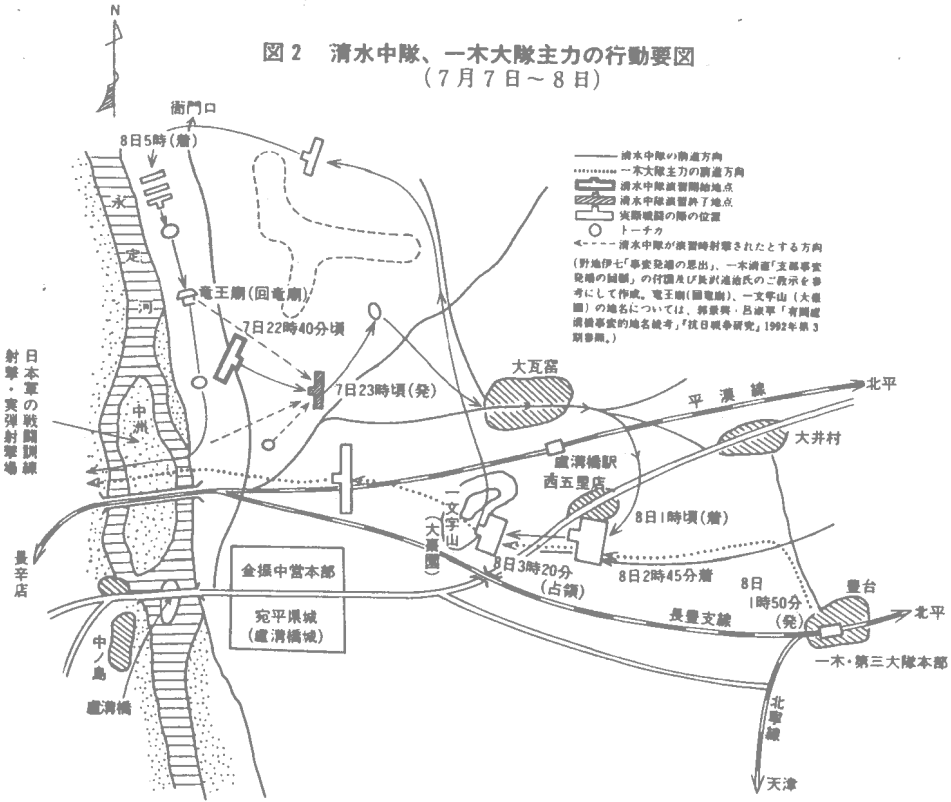
石友三是一个反复无常毫无民族气节的小军阀。原是冯玉祥的部下。1930 年蒋冯阎大战中西北军失败，石逃到天津。二十九军控制平津以后，石友三借助日本驻屯军的势力争得“冀北保安司令”的官职。他向今井武夫求助这件事说明，他已得知日军将在卢沟桥攻击中国军队。他的这一消息，只能是从华北日军方面得到。但在慌乱中他把日期搞错,以为是 7月 6 日。

2. 1937 年 7月 7日,诡秘的夜晚

7 月 7 日午后，驻丰台日军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的士兵头戴钢盔,身背背包,脚穿胶底鞋,步枪机枪均配备弹药,整装出发去宛平城北回龙庙演习。中国守军见到这种情况，即向旅长何基沣报告:“日军今日出外演习,枪炮配备弹药,与往日情况不同。”① 何报告给在保定的师长冯治安（冯时兼河北省主席）。冯立即赶回北平。

第八中队下午 4 时半左右到达演习地点，但看到永定河堤上有 200 多名穿白衫衣的中国士兵在挖战壕，就等到 7 时半天完全黑了才开始演习。这天演习的课目是“利用黄昏接近敌主阵地和黎明攻击”，与他们即将实施的“谋略”——攻取宛平城正相吻合。演习从背对河堤 100 米处向东大瓦窑方向进行。

①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 47 页。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第八中队在卢沟桥演习示意图。

这天晚上，除第八中队外，还有第七中队在宛平城东演习。他们同属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团)第三大队(营)。大队长一木清直参加第七中队的演习。晚 10 时半演习结束。一木没有按常规作演习总结,他“心绪不佳”,说了以下另有含意的话“:今晚是七夕。你们的家乡可能正在过七夕节。我们在这里为国家效劳，局势不知什么时候发生变化，也不知明年七夕是否能见到大家及家乡的父兄。”并勉励大家“努力作战”①。

与此同时，第八中队也结束了前段训练，准备野营休息到明日天亮。中队长清水节郎命令各小队长、假想敌司令中止演习，传令集合。以下发生的事在整个卢沟桥事变研究中至关重要。许多日本人（包括一些历史学者）在记述这一过程时随心所欲地增删、改篡、颠倒原来的内容或顺序，使争论愈发纷乱。这里引述清水节郎在战后发表的《笔记》。这是关于事变发端唯一最原始的资料，所谓“第一枪”的唯一证人。尽管我们对它的真实性并不完全相信，但仍然要把它作为研究的主要依据。我们正是从《清水笔记》记述的自相矛盾和众多漏洞中看出事件的“谋略”性的。《清水笔记》写道：

> 我站着观察集合情况，看到假想敌的轻机枪还在射击。他们不知道部队演习中止，看见传令兵

①一木清直在日本朝日新闻社召开的“卢沟桥事件一周年回顾座谈会”上的发言,译文见《北京档案史料》1990年第 2 期第 37 页。

而射击。突然我直感到从后方射来数发步枪子弹。可是我方假想敌好像没有注意到这情况，继续空弹射击。我命令身旁号手吹紧急集合号时，又受到从右后方铁道桥附近堤坝方向十数发的射击。在这前后，回头看卢沟桥城墙和堤坝上手电筒一明一灭（好像是什么信号）。中队长逐次集合各小队准备应战，得到一名士兵去向不明的报告。立即开始搜索，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丰台的大队长，等待他的指示。①

清水把两名传令兵派去丰台后，那位“失踪”的士兵志村菊次郎自己归队了。从发现“失踪”到志村归队前后只有 20 分钟。清水没有再派人去报告志村归队这一重大情况，而是把中队带到宛平城东 5 华里的五里店待命。

午夜近 0 时，两名传令兵到达丰台，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刚才中队在龙王庙(即回龙庙)附近遭到中国军队射击，我部演习停止了。清查后发现缺少一名士兵。因此中队长让我火速向您报告，并命令中队搜索该士兵和准备战斗。”一木立即想“：仅仅开枪问题还不大,少了一名士兵我觉得事态严重。因此马上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并打电话向联队长牟田口廉也请示。牟田口廉也命令：“驻丰台部队马上出动,占领‘一文字山,,以战斗姿态同中方交涉。’②

①《清水节郎笔记》载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此处引文见该书河出书房新社 1961 年版第 165 页。

②一木清直在“卢沟桥事件一周年回顾座谈会”上的发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